

激进女性主义与乌托邦文学

——夏洛特·吉尔曼的女性“疯癫”书写和女性共同体想象

许庆红

摘要: 本文以共同体和乌托邦理论为视角, 结合激进女性主义批评, 探讨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的女性“疯癫”书写和《她乡》中建构的女性共同体。文章认为两者具有双轨性: 既具有激进主义革命性, 又避免不了乌托邦的负向价值。女性“疯癫”与女性共同体在一定层面上解构了父权话语, 为女性身份及其主体性做了抗争。但是, 两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美好的乌托邦, 而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虚幻乌托邦, 一个蕴含负向价值的乌托邦。“疯癫”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 最终不会被纳入社会主流话语体系; 女性共同体将男性和其它种族他者化, 重新陷入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窠臼。作为 19 世纪末美国转型时期的知识女性, 吉尔曼创作乌托邦文学, 在展示社会和谐、自由与平等的正向愿景的同时, 也意在警示极端乌托邦主义可能带来的恶果。

关键词: 夏洛特·吉尔曼; 疯癫; 女性共同体; 激进女性主义; 乌托邦文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962(2024)06-0119-11

引 言

夏洛特·吉尔曼(Charlotte Gilman) 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讲述女性的生存困境, 颠覆男性话语, 构建女性乌托邦文学。《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奠定了吉尔曼在西方妇女文学界的重要地位, 而《她乡》(*Herland*) 更是激进女性主义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19 世纪美国女性文学中的女性共同体研究”(AHSKZ2019D015)

作者简介: 许庆红, 博士,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美国文学。

引用格式: 许庆红. 2024. 激进女性主义与乌托邦文学——夏洛特·吉尔曼的女性“疯癫”书写和女性共同体想象[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6): 119-129.

思潮和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前者书写了女性“疯癫”，后者建构了女性共同体，两者之间具有共性，都展示了吉尔曼激进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主题。

吉尔曼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重要的美国女性主义作家，其女性主义思想一直备受评论界的关注。国外早期研究大多关注其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女性叙事及其个人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当下批评则呈现多元化趋向，涉及吉尔曼对经济、社会、建筑和服饰等方面的看法。与国外研究相似，国内学界主要聚焦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自我意识、哥特风格、乌托邦建构与怀旧主题等。上述成果均为本文提供了研究基础，但是，既往研究对吉尔曼作品中的乌托邦建构大多只停留在涵义本身及其与怀旧建构的外延关系的探讨，未能上升到对乌托邦蕴含价值的批判式审视。因此，本文以共同体和乌托邦理论为视角，结合激进女性主义批评，探讨吉尔曼在《黄色墙纸》中的女性“疯癫”书写和《她乡》中建构的女性共同体。文章认为两者具有双轨性：既具有激进主义的革命性，也避免不了歹托邦的负向价值。女性“疯癫”与女性共同体在一定层面上解构了父权话语，为女性身份及其主体性做了抗争，展示了社会和谐、自由与平等的正向愿景。但是，两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美好的乌托邦，而是一种极端形式的虚幻乌托邦，一个蕴含负向价值的歹托邦，吉尔曼意在警示极端乌托邦主义可能带来的恶果，因为“疯癫”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最终不会被纳入社会主流话语体系；女性共同体将男性和其它种族他者化，重新陷入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窠臼。本文的探讨以期更深入地研究西方激进女性主义与歹托邦文学的政治预警。

歹托邦、激进女性主义与女性共同体的交缠

歹托邦、激进女性主义与女性共同体是三位一体、相互交缠的概念。首先，“歹托邦”(dystopia)在 20 世纪衍生于 16 世纪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Utopia)中提出的“乌托邦”概念。“乌托邦”指涉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立和没有暴政的完美理想国，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思想的最大价值在于，“用一幅精美的社会图卷激发生活于晦暗现实中的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并对残酷的现实加以讽刺、批判”(马海波，2018: 38)。而“歹托邦”的字面意义是反乌托邦或敌托邦，带有讽刺意味，它“指称一种邪恶与黑暗之地”(马海波，2018: 41)。但是，吊诡的是，歹托邦并非“乌托邦”在概念逻辑上的对立面，反而被认为是后者充分发展所造成的一种状态，如同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中所言“歹托邦被认为是发达的

乌托邦，而不是受损的乌托邦。乌托邦通常被视为乌托邦的逻辑实现，而不是乌托邦的对立面”(Jacoby, 2005: 8)。就文学作品而言，“将乌托邦小说与反乌托邦小说进行比较，如果说前者揭示的是作家对人类理想社会正向价值的崇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作家以负向价值的表述来揭示其作品内涵的正向价值”(胡铁生, 2018: 89-90)。乌托邦是一个概念，一种文学精神，亦是一种现实主义实践理论。

其次，激进女性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在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迅速发展。在“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观点统摄下，它一方面沿袭了19世纪末女性主义对父权话语的质疑，但在另一方面拓宽了政治疆界，涉及更多的议题与实践活动诸如身体、政治、文化、各种权益和暴力等。激进女性主义最关键的概念是批判男权制，认为它是造成女性受压迫的最深刻、最根本的原因，其目标是颠覆男权统治。这一思想最早由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引入女性主义理论中，她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中引入“性政治”概念，指出性是政治的，男女两性之间有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性别不平等关系是所有权力关系的范式：“社会性别制度取代了所有其他不平等——种族、政治或经济不平等的形式”(Millett, 1970: 24)。换言之，父权制下的两性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关系，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巧妙的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言的‘内部殖民’”，它比阶级壁垒更加严酷，比种族隔离更加坚固，并且这种性别支配和被支配关系“已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Millett, 1970: 25)。激进女性主义通过强调文化意识形态表明女性受到的压迫是最普遍的，是其它不公平的根基。因此，她们向传统权力话语及政治观念发出了挑战，提出一系列的设想来对抗男性中心主义，如“女性认同”“姐妹情谊”等，有意拓展妇女团体意识，将“妇女”的含义普遍扩大到妇女之间更多形式的交集，包括女性经验、情感认同与政治实践支持等(Rich, 1979: 200-202)。激进女性主义的政治构想在于，由个体狭小的空间构筑更大的话语势力范围，争取更大的女性群体空间与身份认同，最终与主流话语抗衡，实现女性主体性，亦即女性个体和群体的自由、解放、能动性以及他人和社会的认可。然而，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美国激进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也有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笼统扩大化概念、重陷二元对立和乌托邦理想等方面的缺陷，诸如一些包括查拉·莫罕提(Chandra Mohanty)在内的第三世界女性学者所言，激进女性主义忽略了女性个体、群体和社会身份复杂多样性的现实语境，“除非不同[阶级、种族、文化、地域]女性之间的差异获得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否则妇女之间也谈不上所谓的姐妹情谊。联合整治并不要求所有的团体都相互‘认同’，而只是要求相互倾听并从中发现共同的目标和设想”(何念, 2010: 297)。因此，

美国激进女性主义具有政治上的革命性与合理性，又具有偏颇的过激性，对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者，“共同体”(community) 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认为，共同体“表示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李义天，2011: 8)。亚里士多德将城邦视为一种典型的共同体，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利益……追求的是一种‘至善’，每个成员因为这一目标而团结协作，获得‘幸福而满足的生活’”(Aristotle, 2013: 95)。18 世纪前后，共同体的概念包括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Hegel) 的“社会”和“共同体”以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 中提出的“人的真正的共同体”。黑格尔探讨个体寻求如何以共同体的方式生存与发展，提出家庭、市民、国家共同体三个概念，他们分别通过血缘、生产方式产生个体需求与他人需求的相互满足(黑格尔，1996: 210, 253)。马克思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符合人的需要的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形式”(胡群英，2013: 35)，只有人类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19 世纪，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在《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Civil Society*) 中则通过区分“社会”与“共同体”来明确“共同体”的概念，他强调，“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滕尼斯，1999: 54)，认为共同体有其自己的意志，那就是“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它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 and 共情”(滕尼斯，1999: 71)。他还提出共同体的“三大支柱”——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认为精神共同体凝聚了共同体成员间彼此友好和密切的联系，是共同体的基础，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滕尼斯，1999: 65)。20 世纪下半叶，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中考证，“community”一词自 14 世纪以来就存在，“意指具有关系与情感所组成的共同体”(威廉斯，2005: 79)。在历史的进程中，community 一词具有“直接、共同关怀”的涵义，也可能是“充满感情、具有说服力的词”(威廉斯，2005: 81)。同样，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在共同体中，我们互相依靠对方……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鲍曼，2003: 2-4)。基于以上对“共同体”概念的溯源，我们可以得到它们之间的共性：一、强调个体与社区/集体中成员的互助、关爱与团结，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二、以血缘、情感、信仰为纽带，强调精神与想象在建构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

可见,“女性共同体”具有共同体的很多基本特征,其中包括相似的生活空间、共同的政治诉求、情感纽带等等。女性共同体建立在女性之间相似的身体、情感经验和社会地位上,从而形成了相似的情感纽带和价值认同。她们团结一致,反抗父权话语,争夺女性在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平等地位和权益,呈现了激进女性主义色彩。而想象中的女性共同体或乌托邦式女性共同体是一个女性互相陪伴、信任和互助互爱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父权制压迫,女性通过社会资源的共享实现个人价值与归属感。然而这种排斥男性的设想,构成了排他性女性共同体,很难实现其现实意义上的正面价值,呈现为一个蕴含负面价值的乌托邦。文章将这三个理论进行杂糅,打通一些重要相关概念,尝试对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和《她乡》进行新的解读。

吉尔曼文学建构中的激进主义与乌托邦形态

如前所言,乌托邦小说具有乌托邦小说的逆向特点,乌托邦小说往往描绘一个崇尚正向价值的理想社会,而乌托邦小说则蕴含了一定层面的负向价值。《黄色墙纸》和《她乡》作为吉尔曼的激进女性主义代表作,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呈现激进主义的乌托邦色彩。《黄色墙纸》书写女性“疯癫”,揭示女性在当时父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以及她们走出这一困境的方式。但是,“疯癫”终归不是女性获得解放的最佳方式,而是走向绝境的过激方式。“疯癫”世界的自由终究不是理想的自由,而是虚幻的乌托邦。同样,《她乡》想象了一个单性的、排除异己的女性共同体,明显将男性和其它种族他者化,重蹈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的覆辙,其中彰显的负向价值无疑给共同体沾上了乌托邦的色彩。

(一) 女性“疯癫”书写:激进主义与虚幻的乌托邦

“疯癫”一词在人类史上由来已久,疯癫意象象征着人类巨大的不安,直至18世纪末“疯癫”被确立为一种精神疾病,意指生命个体偏离或丧失理性的病理现象。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中用考古学的方法考察了疯癫史,论证了疯癫的真实内涵。他通过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分析得出,“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疯癫才能被理解。非理性是它的支撑;或者我们可以说非理性定义了疯癫的可能性轨迹”(Foucault, 1961: 83)。还有理论家将“疯癫”界定为“政治上的越轨”“神话或社会建构”以及“由不公正的社会或制度环境所产生”(Staub, 2011: 248),比如,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走近阿尔托》(*Approach Artaud*)中指出“疯癫是一个限定界限的概念;

疯癫的前沿定义了什么是‘他者’。一个社会不想听一个疯子的声音，不能容忍他的行为，他应该被压制……在每个社会中，理智和疯狂的定义都是武断的——从最大的意义上说，是政治性的”(Staub, 2011: 117)。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疯癫也占有一席之地。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女性疾病：妇女、疯癫、英国文化(1830-1890)》(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1890)中提到，医生的话语权力体现了近代科学利用知识权力对人体进行控制，进而控制社会。医生认为，“女性的‘本性’导致精神崩溃”(Showalter, 1985: 123)。这里的“本性”指的是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生理以及心理差异，而这种性差异恰恰暗示了男女两性的社会地位差异，其结果是女性在男性话语和医疗体系话语的夹缝中生存。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形态，疯癫一直激发了文学家的想象和思索，比如莉莲·费德(Lillian Feder)在《文学中的疯狂》(Madness in Literature)中将“疯癫”界定为“一种无意识压倒意识，并控制了个人的观念，以及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状态。根据当时的逻辑思维和相应的情感，这些感受和体验是混乱的、不合时宜的”(蒋天平, 2010: 27)。“疯女人”在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比比皆是，她们被认为是邪恶的、非理性的。女性“疯癫”成为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重要母题，因为“疯癫”书写具有激进主义的革命性意义，既是女性意识觉醒后以极端的形式对父权制的反抗，也是女性重塑自我身份、确立主体地位的策略，刘风山评论的切中肯綮，“疯癫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来，成为一种文学策略，被赋予了颠覆性的社会、政治功能……疯癫是她们构建的用于在难以生存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的特殊策略”(刘风山, 2007: 93)。疯癫者始终站在理性的对面，以激进的方式言说自我，虽然遭到理性的排斥和放逐，但疯癫书写将女性“疯癫”的非理性负向价值转变为女性身份建构的积极作用。

《黄色墙纸》中的“疯癫”书写具有激进主义革命性意义，解构了父权话语对女性的压制和禁锢，让女主人公在“疯癫”中获得了自由与解脱。女主人公在小说的前半部分被描绘成一个病态的弱者。她因为神经衰弱被医生丈夫实行当时社会非常流行的精神衰弱疗法——“休息疗法”，丈夫告诫她“丝毫不要耽于幻想”(吉尔曼, 2014: 211)。她被限定在逼仄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牢笼里，具有权威的丈夫美其名曰帮助她恢复身体，实则禁止她写作和思考。在长期的幽禁之下，她无所事事，整日盯着墙上“污秽的”“怪味的”“糟糕的”具有“自杀性艺术”设计的黄色墙纸，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一步一步走向“疯癫”。她啃噬桌角、在地板上蠕动，将自己想象成囚禁在墙纸后面的女人，最后撕毁墙纸，解放了墙纸背后的女人。细读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叙述者的行为越“疯癫”，她的女性意识越觉醒，也越加

掌握了话语权。她从原先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接受被治疗、接受被安抚，变成了一个主动的言说者和行动者，小说的后半部，她开始对丈夫发号施令，大胆“注视”并拒绝丈夫的命令，采取撕毁墙纸的行动。这一撕毁墙纸的“疯癫”言语和行为实际上揭示了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墙纸无疑象征着将女性困于其中的父权话语结构。当她撕碎墙纸时，叙述者获得解放，其长期压抑的自我身份与主体性最终得以实现。

同时，女性“疯癫”又是一种乌托邦书写。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一方面论证了疯癫是一种虚无，是对理性的否定，同时也指出，疯癫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其建构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在《黄色墙纸》的结尾，女主人公的疯癫对代表科学、理性和权威的丈夫来说，其行为是非理性的、疯狂的、不符合社会规范的，因为当时的社会认定，凡偏离社会准则的行为规范都是道德迷乱的疯子。女性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心中发病；要么追求自由、实现自我而被认定为疯子。显然，《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选择的是后者。“休息疗法”旨在消除女性的反叛意识并逼迫她们顺应当时的社会规范。作为权力机制试图被规训的对象，女主人公以非理性的方式对抗理性，挑战社会规范，以“疯癫”来摆脱禁锢，寻求自由。然而，这并非真正的、获得自我解放的理想乌托邦，因为在19世纪父权当道的美国社会，个体以“疯癫”对抗象征父权话语的理性，最终只能遭到权力机制的“排斥”与“禁闭”——被送入疯人院或游走于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真空状态”，遭受“双重禁闭”，走向更大的绝境。

可见，《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为了反抗当时的美国父权社会规范，不惜化身为疯女人。即使疯癫使她摆脱了心理困境，但无形中也与女性与非理性联系在一起。作家将“疯癫”理想化，虽然表现的是女性的无奈，但最终从女性主义乌托邦走向乌托邦，薛春霞的评论切中要害，“将女性疯癫浪漫化，忽略女性心理力量与社会力量绝然不对等的社会现实，束缚女性诉说方式，最终失去辨识自身处境的能力”（薛春霞，2009：72）。非理性这一负向价值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终将被纳入社会主流话语体系。

（二）“她乡”的建构：女性共同体与极端的乌托邦

吉尔曼在《她乡》中建构了“她乡”这个女性理想国，一个想象的女性共同体。首先，《她乡》中的女性有着共同生活空间或地域——“她乡”和“庙宇”。滕尼斯认为，长久保持与土地或房屋的关系，就会形成共同体生活。土地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它不仅为人们提供栖身之所，也为人们提供生活稳定性、社会认同感和安全感。《她乡》中的女性以地域为依托，“她乡”隐匿于山林之中，居民在这片

自己依恋的土地上精心养护了森林，建造了自己的国家，整个国家呈现出花园一般的美丽——“完美开垦的土地”“引人注目的建筑和小镇整齐有序的美感”（吉尔曼，2014：16）。她们还限制人口，控制牲畜数量，将自己的家园打造成天人合一的世外桃源。同时，“她乡”中还有一个神圣、重要的场所——庙宇。庙宇中拥坐着睿智而高贵的女性，每当女性居民遇到困难和需要时，“她们便各司其职，时时准备予人以慰藉与援手，并为其指点迷津”（吉尔曼，2014：152）。庙宇是一个开放、流动的家园，任何女性都可以去庙宇中提供服务，充当圣母和圣殿咨询师，用她们的智慧和爱为有需要的人抚平心中伤痕。小说中的地域共同体成为传统、教育、宗教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场所，女性居民们将本民族的文化与传统的农耕自由文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建构了独特的文明。

其次，“她乡”的女性以新型母职观和姐妹情谊作为情感纽带，体现了她们对身份、价值以及共同体本身的认同，凝结成滕尼斯所言的精神共同体。吉尔曼提出了一种新型母职观，即母职社会化和神圣母职观的理想。母职社会化体现女性掌握生育的主动权，她们采用集体育儿法，分工协作，各施所长，形成紧密的联系。通过母职社会化，将单个家庭的母子关系转变为社会化的母婴社群，这样，女性不再被囿于家庭，可以进入公共领域，从事自己想要的工作，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吉尔曼认为，母职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信仰，“她乡”的女性将母职看作最高尚的社会服务，“一种圣礼”（吉尔曼，2014：95）。同时，姐妹情谊也是维系女性共同体重要纽带，“是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魏天真，2003：89）。“她乡”里的女性居民们通过“平静和谐的姐妹情谊”（吉尔曼，2014：12），彼此联结，获取归属感。比如，她们团结一致，联合抵御外敌。根据“她乡”中一段特别的历史，由于战争，奴隶趁机叛乱，残忍杀害无辜的人民。最后愤怒的女性没有顺从奴隶的意志，而是一起“在绝望中奋起，杀掉了残暴的征服者”（吉尔曼，2014：76）。

再者，“她乡”中的女性共同体具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她乡”呈现为女性自由王国。在这里，她们摆脱传统性别观的束缚，重塑了女性自我与主体性，传递了女性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的乌托邦愿景。比如，吉尔曼深谙作为一种文化与政治符号的服饰，不同于19世纪女性的繁琐着装，《她乡》里的女性“一身轻便结实的衣着，很像短裤和及膝袍子”（吉尔曼，2014：21），在她们的服饰上找不到任何装饰性的流苏和花边。性情方面，她们不再被塑造为“家中的天使”，不再具有天真、温顺、被动等刻板印象，而是一群独立自由的

女性。思维方式方面，“她乡”的女性也不再是男性的附庸物，她们不仅可以操持家务、养育后代，还可以从事科学研究，投身于社会建设。比如，她们采取集体管理的方法，开发出一套卓越的集约型农业体系，用以平衡人和自然的关系。因此，吉尔曼从多个方面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扩大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打造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乐园。

但是，这一想象的女性共同体也存在着其缺陷。如前所言，激进女性主义强调，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夸大了男女两性之间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从而强化了两性的不平等权益。在激进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要想在社会获得一席之地，就需要走与男性分离的女性认同道路。吉尔曼在《她乡》中塑造了拥有单性繁殖、繁衍后代能力的女性，无论是她们所吃的食物还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是母亲的果实。“她们因母亲而生，靠母亲而活”（吉尔曼，2014：82）。吉尔曼刻意塑造的这一女性共同体一方面具有超前的激进女性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它过度将女性置于男性的对立面，强调母性的优越性，而将男性他者化，同时，《她乡》中想象的女性共同体还是一个专属白人女性的乐园。“她乡”的公民是“白人”，拥有纯正高贵的“雅利安血统”，其文明也“曾与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文明保有联系”（吉尔曼，2014：75），而“她乡”的周围是未开化的土地，有很多原始的部落和奇怪的动植物。这些都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作品的白人优越论思想，将其他种族他者化和妖魔化，并否定他们的文明。性别与种族的他者化使吉尔曼的女性乌托邦式想象不可避免地重新落入本质主义的圈套，呈现为具有负面价值的乌托邦。

结 语

共同体和乌托邦都指向理想的家园和乐园，总是被用来激发美好的联想。然而，一旦对它们的建构走向了极端，共同体便成了想象，乌托邦便成了乌托邦。吉尔曼在《黄色墙纸》和《她乡》中塑造的是美国20世纪之交的新女性形象，“新女性的‘新’体现在精神、经济、感情上的独立性”（程心，2022：110），呈现女性主义在追求两性平等、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愿景。然而，《黄色墙纸》中的“疯癫”并不是让女性获得真正自由的方式，《她乡》中的女性共同体也是一种极端乌托邦主义。我们必须认识到，吉尔曼是一个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她深刻意识到当时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与自由发展障碍，因此她将社会批评的重点放在性别方面，正如黛博拉·马德森（Deborah Madsen）（2000：77）所言，“父权制为吉尔曼的写作提供了性别语境”，也如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 Gubar）所言，女性作家深受“身份焦虑”的

影响,某种意义上,“她们被拘禁在某一特定‘位置’上,被限定在起居室内、闭锁在文本中、关在厨房里和刻写于诗歌内”(吉尔伯特、格巴,2015:108),这些都直接激发了吉尔曼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与乌托邦建构。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乌托邦文学创作的真实意图,如凯斯·布克尔(Keith Booker)在《乌托邦文学:理论与研究指南》(*Dystopian Literature: A Theory and Research Guide*)中所指出的,“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明确将自己置于乌托邦思想对立面的文学作品,它警示人们极端的乌托邦主义可能带来的恶果”(Booker,1994:3)。因此,我们可以说,吉尔曼通过展现乌托邦中蕴含的负面价值达到了批判父权话语的正面效果,她刻意书写的乌托邦文学恰恰是要彰显她的政治乌托邦抱负。正所谓言,尽管乌托邦主义经受种种驳难,但乌托邦精神却不会消失。当今社会,性别问题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女性主义创作、批评或妇女运动来解决,而是有赖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与完善,有赖于构建真正和谐的性别共同体。

参考文献:

- 程心. 2022. 再论美国新女性文学研究[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33(4):108-118+159-160.
- 斐迪南·滕尼斯. 1999. 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念. 2010. 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黑格尔. 1996. 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群英. 2013. 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建构[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 胡铁生. 2018. 理想社会建构的文学思维模式——以西方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小说的正向与逆向思维模式为例[J]. 甘肃社会科学(2):84-93.
- 蒋天平. 2010. 神圣的疾病:美国小说(1950-1970)中的疯狂形象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
- 雷蒙德·威廉斯. 2005.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李义天. 2011. 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风山. 2007. 疯癫,反抗的疯癫——解码吉尔曼和普拉斯的疯癫叙事者形象[J]. 外国文学评论(4):92-100.
- 马海波. 2018. 对乌托邦主义的再考察[J]. 文艺理论与批评(6):38-45.
- 齐格蒙特·鲍曼. 2003. 共同体[M].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格巴. 2015. 阁楼上的疯女人[M]. 杨莉馨,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魏天真. 2003. “姐妹情谊”如何可能[J]. 读书(6):88-92.
- 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 2014. 她的国[M]. 王骁双,等译.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 薛春霞. 2009. 当疯癫不再是偶然——20世纪美国女性的心理问题与文学诉说[J]. 妇女研究论丛(5):67-73.
- Aristotle. 2013. Politics [M]. Lord C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oker M K. 1994. *Dystopian Literature: A Theory and Research Guide* [M]. Westport &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 Foucault M. 1961.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M]. Howard R (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Jacoby R. 2005. *Picture Imperfect: Utopian Thought for an Anti-Utopian Ag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dsen D L. 2000. *Feminist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M]. London: Pluto Press.
- Millet K. 1970. *Sexual Politics* [M]. New York: Garden City, Doubleday & Company, Inc.
- Rich A. 1979.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 – 1978* [M]. New York: W. W. Norton.
- Showalter E. 1985. *The Female Malady: Women, Madness and English Culture, 1830 – 1890*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taub M E. 2011. *Madness Is Civilization: When the Diagnosis Was Social, 1948 – 1980* [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liams R. 2014.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dical Feminism and Dystopian Literature: Charlotte Gilman's Writing about Female "Madness" and Imagined Female Community

XU Qinghong

Abstract: In light of community and utopian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radical feminist criticism, this paper explores female madness in Gilman's *The Yellow Wallpaper* and imagined female community in *Herlan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two concepts have their duality of radicalism and dystopia. Female madness and female community deconstruct the patriarchal discourse at a certain level and fight for the female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However, these two are not fine utopias in a real sense, but an extreme form of illusory utopias, or a dystopia containing negative values. Madness is the opposite of rationalism and will not be accepted in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system. The female community, by otherizing men and other races, falls into the snare of dualism and essentialism. As an intellectual woma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America, Gilman created dystopian literature, which not only revealed the positive vision of social harmony, freedom and equality, but also aimed to warn the possibl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extreme utopianism.

Key words: Charlotte Gilman; madness; female community; radical feminism; dystopian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欧阳沐子